

文化冷战背景下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胡腾蛟

(长沙学院, 湖南长沙, 410022)

摘要: 冷战期间, 出于反击共产主义与消解“反美主义”的政治、文化需要,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大量的图书, 致力于展现一幅“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充满活力”的美国形象, 以一种非常隐性的方式推动了反共宣传, 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身份的文化建构和外界的心理认同, 从而推动了美国文化边疆的扩张。

关键词: 文化冷战; 美国图书; 海外传播; 国家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186-07

国家形象塑造是指一国运用公共外交策略向国际社会输出核心价值观、强化外界对其身份的认同, 以实现国家利益的举动。冷战无疑是一场美苏之间的形象宣传战。运用各种文化媒介以美化自我形象是冷战突出的特点。图书即是超级大国形象宣传的重要手段。冷战爆发后, 美国海外图书馆与图书的输出空前扩张。随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兴起, 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但现有成果侧重于对美国图书如何为其冷战战略服务的研究, 而少有美国图书传播对国家形象塑造、宣传的相关研究。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美国国会文献集(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等新近解密档案, 从文化冷战和软实力竞争的双重维度系统分析美国如何运用图书这一特殊武器从事形象宣传战, 尝试从新的视角洞悉其战略实质。

一、美国图书的早期海外传播

美国立国者将图书馆视为“民主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富兰克林在费城建立公共图书馆; 杰斐逊以个人图书馆为基础创办弗吉尼亚大学; 麦迪逊、门罗则支持国会建立图书馆。1862年, 美国《赠地法》通过后, 新型大学开始出现, 也逐渐改变了美国社会对图书馆的看法, 视其为“大学的心脏”。为推动美国图书

馆的海外拓展, 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 由卡尔·米兰具体负责。至1902年, 美国图书馆协会在不列颠群岛建立了800多处市民教育图书馆。1917年, 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希腊成立图书馆,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国外建立图书馆。^[1]1927年, 美国在拉美一些国家成立了小型双边图书馆(binational libraries), 主要从事学术和文化研究。

二战爆发后, 为了反击纳粹德国在拉美的文化攻势, 负责拉美文化事务的尼尔森·洛克菲勒除了资助原有的双边图书馆之外, 还联合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新馆, 如在墨西哥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巴西利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图书馆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林肯图书馆等。^[2]1943年, 美国战时信息处在伦敦创办图书馆, 第一次将图书事业拓展到西半球以外的地区, 随后又在斯德哥尔摩、里斯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莫斯科、重庆、贝鲁特、墨尔本、悉尼和大马士革等地设有24家国际图书馆。^{[3](294)}1945年8月, 杜鲁门撤销战时信息处, 将图书馆事务移交国务院国际信息处管理。除了负责信息处的图书馆外, 国务院还管理其他三种类型的图书馆: ①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建立、获得国务院合同支持的拉美图书馆; ②西德美占区的“美国之屋”; ③美国在奥、日、韩占领区的信息中心。^[4]

美国海外图书馆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图书的输出。不过, 由于美国人信奉所谓的“文化自由主义”, 多年来, 主要由私人组织负责图书传播, 展示美国价值。

收稿日期: 2015-07-09; 修回日期: 2015-10-17

基金项目: 2014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冷战背景下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及其形象宣传研究(1945—1961年)”(14YBA017)

作者简介: 胡腾蛟(1978—), 男, 湖南邵东人, 历史学博士, 长沙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冷战国际史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文化自由主义”逐渐让位于国家主导的文化外交战略。1932年,国务院拉美司司长萨姆纳·威尔斯开始考虑介入美国图书海外交流事务,致力于推行罗斯福对拉美的“睦邻政策”,扩大美国图书在拉美地区的传播。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卡尔·米兰为此确定了四条原则:①向接受英语教育的拉美人提供综合和专业性图书;②培育对外教育和文化发展;③创建示范模式与训练中心,讲授“美国图书馆学”;④销售美国图书。^[5]

二战期间,美国出版业成立战时图书委员会,从事图书传播活动。1945年,美国政府成立美国图书中心,意欲在世界范围内重建被战火损毁的图书馆。中心为此建议,自次年1月1日起发动全国性的图书收集运动,呼吁社会各界向战争区内盟国捐赠图书。1948年,美国图书中心变更为美国图书交流有限公司,负责图书交易和捐赠事宜。^[6]

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不再需要战时宣传,要求海外信息文化活动仅展现美国“完整而公正的图景”。^[7]然而,随着冷战的降临,图书的战略宣传功能将再次被激活。

二、文化冷战的爆发与美国图书海外传播的强化

美苏之间的文化紧张在二战结束之际已凸现出来。德占区的美苏双方利用图书、戏剧与电影抹黑对方形象。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图书逐渐被重新纳入美国对外政策体系当中,成为文化冷战的工具。马歇尔计划作为推动世界“美国化”的重要举措,将传播美国书籍视作战略手段。随后,“第四点计划”出台,继续强调资助技术和图书在第三世界中传播的重要作用。1948年1月,国会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法案第202部分授权国务院负责美国著作和期刊的海外交流,并最大程度地利用私人服务。

1950年,杜鲁门启动“真相运动”,海外图书项目的使命面临调整。次年3月,作为国务院顾问,威尔明顿研究所免费图书馆馆长哈兰德·A·卡彭特、托马斯·Y·克罗韦尔公司总裁罗伯特·L·克罗韦尔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社长切斯特·克尔一行三人赴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17个国家的海外信息中心调研,撰写了《关于国务院海外信息项目图书利用的报告》,强调:“在一所美国海外图书馆的开放性图书中,一本对美国生活某些方面提出批评的、未经审查的著作的存在,比一张宣传千百次的小手册更能让一位质疑的读者相信美国目标的诚实性以及美国缺点获得坦率的承

认。”^{[8](3-5)}在卡彭特的推动下,国会、国务院、教育交流顾问委员会共同强化对海外图书输出的管控,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海外图书委员会,“在其能力范围内,就第402号公法实施的项目中关于最有效地利用图书和期刊的问题向顾问委员会和国务院献策”。委员会主席由哲学博士、天主教大学教授马丁·R·P·麦圭尔担任。其他7位委员分别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总裁乔治·P·巴莱特、哈伯兄弟公司董事会主席卡斯·坎菲尔德、托马斯·Y·克罗韦尔公司总裁罗伯特·L·克罗韦尔、伊利诺斯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B·唐斯、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莫里斯·哈德利、德克萨斯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列维斯·汉克以及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凯斯·D·麦特考夫。海外图书委员会于1952年2月27日和5月24日两次召开会议,商讨图书输出事宜。国务院在综合考虑顾问委员会和海外图书委员会的建议后,最终制定了海外图书挑选政策。基本内容如下。第一,政策目标。利用出版材料“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推动其他国家对美国及其民主理想与制度的理解与欣赏”;“为实现世界的自由与和平促进更充分的信任与合作”。基于上述目标,挑选的出版物应“促进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公正理解”;纠正外界对美国的“误解”与反击反美宣传;展现美国对科学的贡献;了解美国的世界形势观,特别参考苏联的“侵略”举动;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揭露共产主义思想的“荒谬性”。第二,出版物的选择标准。①促进项目目标的;②美国作者的译著或原著(包括促进项目目标的外国著作);③权威作家的;④地区内具有吸引力与能够影响受众的;⑤具有重要意义与普世性的;⑥文学类。此外,国务院还要求那些“遵循美国民主生活方式经常批判美国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出版物或有争议的著作均应包括在内,因为它们“通过多样性的观点和冲突性的意见提供一种真实的、公正的美国生活图景”。^{[8](3-5)}可见,挑选政策的出台强化了图书对美国形象的宣传。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苏之间的图书宣传战更趋激烈。1953年6月,美国政府一份绝密文件指出,“共产主义的图书项目规模庞大,扩张到许多国家。”^[9]至1955年,苏联向美国输出250多万箱图书,其中包括500余万册宣传材料;1951年至1957年,中国用包括英语在内的8种不同的语言出版了400多本不同的著作,共465余万册,涵盖各类主题,“以吸引所有可能的目标群体”。^[10]同时,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浪潮涌现,第三世界、甚至“自由世界”强烈质疑美国的对外政策与文化,这一切都使得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强化图书的反共与形象塑造功能。

鉴于上述情形,1953年8月,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规定符合以下四个标准的图书方能获准输出国外:

“很好地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图书;国会或国内反馈意见良好的图书;其他文化可接受的图书;外国受众能理解的图书。”^[11]9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毫不犹豫地阻止包括对这一个阶段或那一阶段美国生活的正当批评”,“政府禁止资助颠覆性图书的传播”,因为此类传播无益于“促进美国目标在海外的实现”。^[12]1954年2月,行动协调委员会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利用出版物和图书馆强化美国对其他国家领导层的战略影响。4个月后,特别小组出台一份长达46页的秘密报告,指出,“在海外利用著作和出版物对于实现美国的目标极其重要”,要求“在目前半个世纪内扩大美国图书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反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及其在科技、文化领域内的成就。^{[3](298)}1955年底,议员巴拉特·奥哈拉和迈克尔·费翰在东南亚调查信息项目后鼓动国会为新闻署的图书项目立法,加强“美国民主”类廉价书籍的传播。法案通过后,奥哈拉随即成立图书挑选委员会,宣称图书的“最优选择”就是挑选“超越党派偏见和论争”的材料与“美国不朽的档案”。^{[3](99)}

“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美国的宣传风格逐渐由“心理攻势”转向“文化渗透”。美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显示,至1958年,苏联图书输出量较前几乎翻了一番;1959年,“在非洲的书店里,廉价的共产主义译著随处可见。”^[13]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利用图书以强化美国形象的文化建构,挫败共产主义的宣传。正如学者查尔斯·A·汤姆斯所说:“如果美国是鲍蒂弗尔太太,她作为理想的慈善家形象应该在送至海外的图书中得到反映。”^[14]1961年,美国官方报告再次强调:“共产主义者已再次认识到思想与信息在其所处的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和中国可资利用的书籍、电影和其他信息材料非常丰富……若美国不能输出材料,共产主义者就会因为我们的弃权而抢占这一领域。”^[15]9月,国会通过《富布莱特-海斯法案》,法案第102部分授权美国政府与外国“相互交流书籍、期刊和政府出版物”。^[16]按照新法案的要求,新闻署强化了译著输出标准:“涵盖的图书必须在支持美国政策目标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以及有利于反映美国。”^[15]次年,图书与图书馆项目美国政府委员会成立,指导图书挑选及图书馆事务。总之,美国海外图书选择标准虽然历经变化,但展现积极的“美国形象”始终是其核心主题。

三、海外图书中的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为了确保图书的输出,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图书项目。杜鲁门时期主要有信息媒体保障项目(1948—1968年)、信息中心项目、美国援外合作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图书项目(1948年启动)和富兰克林图书项目(1952—1979年)。其中,信息媒体保障项目最为重要。最初,《这一周》杂志编辑威廉·尼科尔斯向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处指出,欧洲货币的疲软严重限制了美国图书、电影材料的商业性传播。为解决这一问题,马歇尔计划制定了信息媒体保障项目。政府支持出版商和传媒者向那些外汇短缺的国家出口图书制品,购买国可用本币支付款项,以使其能够消费美国文化而不会耗尽有限美元储备。1949至1967年,信息媒体保障项目通过商业渠道向海外出售约8300万美元图书。^[17]美国政府还为项目制定了严格的输出标准。国会要求输出的材料“反映美国生活中的最好元素”以及“在其他国家眼中不会败坏这一国家的声誉”。1954年,美国新闻署官员在国会拨款听证会上强调,新闻署已为项目的适用范围确定了“一套严格的标准”,“不适合输出”的图书涵盖:“倡导或支持非法目的的出版物;出于传达、散布或强化共产主义宣传目的的资料;淫秽色情作品和含有问题的语言、情节和场景的纯文学或艺术作品;对犯罪、邪恶或相似情况的事实报告加以煽动性利用的材料;使他国怀疑、玷辱美国声誉的低劣、夸张或耸人听闻的任何其它材料。”^[18]

艾森豪威尔在原有海外图书项目的基础上又密集推出了图书翻译项目(1956—1960年)、英语图书项目(1956—1964年)、廉价名著项目(1957—1975年)、图书配送项目(1956—1991年)。其中,图书配送项目面向东欧地区,持续时间最长、最有成效,被称为“铁幕之后西方秘密实施的思想马歇尔计划”。这一项目除了利用印刷品支持东欧的“新精英的修正主义倾向”和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选择”外,“主要目标就是展示西方的卓越成就”。^[19]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展了图书捐赠项目(1960—1980年代)、菲律宾美国教材出版项目(1961—1966年)、印度—美国教科书联合项目(60年代—1981年)、美国政府委员会图书与图书馆项目(1962—1977年)、法属非洲图书项目(1962—1979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墨西哥国立大学联合创办的泛美学术图书中心(1965—1976年)、印尼第三教育工程(1973

—1978/79年),^[20]基本上完成了图书的全球布局。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向世界各地输出的图书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主旨无非是为了展示良好的美国形象以战胜共产主义。笔者在《美国国会文件集》中检索到一份“美国新闻署‘图书中的美国’项目海外输出挑选书目汇总表”^{[21](133-156)},它对250本著作的观点或内容逐一加以介绍,实际上也可看作新闻署选中它们的理由。新闻署借此塑造一幅“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充满活力”的美国形象。

一是塑造“富足”而“变革”的经济形象。这类图书致力于阐释美国制度造就经济“富足”,而“变革”始终是其内在的动力。如艾伦·G·鲍格的《从大草原到玉米地带》(19世纪伊利诺斯州和爱荷华州大草原上的农耕)(1963年版)记载了“美国人民……在玉米地带核心区域开创了世界上曾最繁荣的农业经济”;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的《1900—1950年大变革:美国自身的转型》(1952年版)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民主化推动美国生活的特征与品质的变革”;大卫·莫里斯·波特的《经济富足与美国品性》探讨“经济富足对美国人民的影响”;格哈德·康姆等的《美国人民的经济》(1967年版)分析了美国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取得和维持高生产率和高生活水平”。^{[21](133-156)}

二是塑造“民主”而“自由”的政治形象。这类图书主要展现“民主”“自由”与权力制衡是美国的本质特征。如卡尔·鲁突斯·贝克尔的《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1942年版)“对独立宣言和自然权利学说的哲学背景作了经典解读”;埃德温·埃默里的《媒体与美国:新闻解释史》(1962年第2版)显示了“自由媒体与民主政府之间的互动”;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的《西奥多·帕克,美国圣战士》(1947年第2版)是“一本展现民主社会如何纠正其缺陷的优秀范本”;路易斯·哈茨的《美国自由传统:自革命以来的美国政治思想阐释》(1955年版)强调“美国共识就是自由的共识”;吉尔伯特·霍布斯·巴恩斯的《反奴隶的冲动(1830—1844)》则显示了“人类自由道德事务的力量”;阿诺德·M·罗斯的《权力的结构: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进程》(1967年版)宣称“政治权力依赖于组织的多样性”;罗伯特·阿兰·达尔的《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冲突与一致》(1967年版)认为:“美国多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定理是,国家权力并非是单一中心的,必定存在着多个权力中心。并且没有哪一个中心能够取得凌驾地位。”^{[21](133-156)}

三是塑造“充满活力”的社会形象。这类图书重

点刻画了美国移民、劳工、黑人及社会精英的生活,展示美国生活方式确保多元社会群体价值的实现。如奥勒·埃德加·诺尔瓦格的《地球上的巨人:草原传奇》(1927年版)描述了挪威移民家庭在南达科塔草原顽强生活的故事,反映了“移民在成就这个伟大国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杰克·巴巴什的《美国工会》《结构、政府和政治》(1967年版)研究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国内生活和制度特征”;詹姆斯·鲍德温在《向苍天呼吁》(1963年版)中以“炽热感人”的笔调描述了一位美国黑人青少年的宗教、心理和情感体悟;詹姆斯·艾吉的《家庭亡故》(1957年版)“描述家庭日常生活的普通性,显示人类经验的共同性”。名人励志类传记也在输出之内。如玛丽·安廷的自传体小说《应许之地》(1912年插图版)揭示了“早在1912年,美国就为美国化的移民提供自由教育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廷小姐尽管身处贫困和绝望之际却依然信奉美国民主思想”;海伦·亚当斯·凯勒的传记《我的一生》(1951年版)描述了作者本人如何成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工作者”;威廉·迪恩·豪厄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964年版)刻画了美国富翁塞拉斯·拉帕姆在失意之时宁愿自己倾家荡产、也不愿将灾难转嫁他人的品质,揭示了作者“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乐观”。^{[21](133-156)}

四是塑造“多样性”的文化形象。这类图书着重描述了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其“多样性”,它是“美国经验的真谛”。如奥利弗·沃特曼·拉金的《美国艺术与生活》(1960年修订版)展现了“美国创造性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艾伦·洛马克斯的《北美民歌》(1960年版)则选择了300余首原创旋律,向读者“展现了美国的传统,涵盖开拓性的职业、赛事、爱情庆典、暴力、宗教热情和艰苦岁月”;路易斯·布克·赖特的《1607—1763年美国殖民地的文化生活(新美国系列)》(1957年版)指出美国人“在宗教、阅读旨趣、建筑、装饰艺术、音乐、科学追求方面的多样性”;纳森·埃尔·格莱泽的《超越熔炉》(1963年版)宣称“并没有一种大一统的美国文化从大熔炉中出现”;弥尔顿·迈伦·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与民族源起的角色》(1966年版)认为:“尽管不同的美国移民已具有广泛的文化适应力,但基于宗教、种族和民族性结构之上的独立的亚团体却持续存在。作为一种关键变量的社会或结构多元主义……必须得到认识,以便于理解美国经验的真谛与问题。”^{[21](133-156)}

四、美国图书海外传播的影响与局限

美国政府联合美国图书馆协会、富兰克林和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协会、文化自由大会等私人组织,实施了十余项海外图书项目,逐渐构筑一个庞大的海外图书输出体系,推动了美国海外文化格局的发展。至1964年,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著作输出最多的国家。由于美国突出“去宣传化”的宣传策略,强调海外图书项目对“美国价值”的学理性描述,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海外图书的功能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交流”,还在展现“美国形象”、凝聚“自由世界”的“冷战共识”、消除“反美主义”与共产主义影响等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第一,推动了美国冷战目标的实现。为了击败共产主义,美国政府制定了庞大的对外宣传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转而奉行“和平演变”战略,将对苏“文化渗透”列在首位,图书因而充当“赢取人心”的全球性争夺工具,美国藉此塑造其完美形象,以反衬共产主义的“黑暗”,令世界抛弃共产主义。新闻署在评估报告中指出,图书翻译项目“为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促进民主观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13]美国图书输出还有利于凝聚“自由世界”的“冷战共识”,共同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各种宣传材料在北约的出版发行,“加强了北约成员国之间关于反共政策、方略等方面的信息交流,在许多国家成功地削弱了共产主义的力量。”^[22]尽管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悲剧,但美国图书在对苏冷战中的颠覆性作用不容忽视。

第二,拓展了美国的文化边疆。战后美国重视对外文化活动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加速构建美国文化地缘政治体系。美国信息中心、图书馆遍布世界各地,长期扮演着“文化触角”的角色,甚至将美国“民主”输送至穷乡僻壤,美国的“文化边疆”得以扩张。反过来,“文化边疆”的巩固又受益于美国图书的大众性。如1959年,新闻署长乔治·艾伦强调摩洛哥马拉喀什新图书馆的受欢迎程度:“这一地区的民众急于参加中心的情形由如下事实证实:在一个月之内,如此之多的读者想借阅图书以致我不得不签发六种不同颜色的图书卡,每一张对应一周的每一天——红、蓝、绿、黄等——卡片持有者仅在与自己持有的卡片的那种颜色相对应的那一天前来图书馆。”^[23]美国图书受到热捧,无疑有利于美国界定世

界其他地区社会科学家的观念边界,实现社会科学话语的同质化,进而培养“民主的公民”。

第三,有助于改善美国形象。战后美国迅速崛起,其身份与形象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欧洲文化精英将美国视为“文化荒漠”或“逆流”;二是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思潮对美国价值与政策的质疑。因此,美国竭力展现其民主精神、自由传统及生活方式,以消除外界的反美心态。作为“美国理想、品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载体^[24],图书通常被美国决策者委以形象塑造的重任。事实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国图书致力于塑造一幅“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充满活力”的美国图景,这种选择性的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外界对其身份的认同,从而在文化维度上为美国形象“正名”。由是观之,美国向海外输出大量的图书,在反击共产主义与反美思潮中强化了美国身份的社会性建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美国海外图书输出也面临着多重制约,其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首先是外国受众的制约。国务院和新闻署的评估报告强调图书在改变对象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的观念方面成效显著,不排除他们当中确实因为美国图书的影响而崇拜“美国价值”,进而成为亲美派的可能。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语言、知识层次和理解能力的障碍,他们要将美国思想内化为自我信念并非易事。尤为重要的是,对“美国价值的理解、欣赏和认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很高的时间成本。其次是国内“文化自由主义”的抵制。当美国图书沦为政治工具时,其可信度遭到国内文化自由主义者的质疑。玛丽·尼尔斯·麦克指出:“当地面上的油印机正在翻印着捍卫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的最近行动的声明时,图书馆的功能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25]应该说,“冷战共识”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文化“自由主义”的侵蚀。鲁塞尔·H·巴特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工程从来不允许在思想的角逐场上完全发展起来。”^[26]最后还面临着外国的文化反弹。为了争夺全球霸权,美国新闻处利用出版物积极“推销和描述美国”,造成了与欧洲老牌文化大国之间的文化紧张。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美国新闻处在图卢兹和里昂等地成立印刷公司,由于它们的“活跃与高效”,以致遭到法国首相的“过问”,并于1954年限制美国在法国的种种图书活动。^[27]

五、结论

美国图书的国际传播一直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内

容。而冷战使其规模空前扩大，也极大地强化了图书的战略宣传功能。本文将美国图书置于文化冷战背景下，基于跨学科视野重点揭示了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及其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第一，图书充当反共与宣传美国形象的重要手段。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为此启动了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在世界范围内输出大量的著作、新闻稿、专题特写、剧本、期刊、宣传手册、漫画，既有赢得文化冷战的现实考虑，也有强化自我形象(身份)的迫切需求，这就是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双重主旨。

第二，美国政府利用图书塑造自我形象是一种选择性塑造。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国图书致力于塑造一幅“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充满活力”的美国图景，这些要素通常被美国奉为核心价值。出于完美展现自我形象的考虑，图书对美国所固有的弊端涉及甚少，甚至没有涉及。因此，美国形象修辞实为溢美之词。

第三，相较于其他公共外交手段，美国冷战图书所起的作用颇为独特。与美国之音的强势宣传不同，美国书籍偏重于“学理性”说服，以更为隐性的方式进行反共宣传，更有利于其冷战目标的实现。同时，美国书籍的海外传播，拓展了美国的文化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形象(身份)的文化建构和外界的心理认同。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5: 149-153.
- [2] 常贝贝. 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馆项目与心理宣传战[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 60-65.
- [3] Kenneth A.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M].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 [4] Mary Niles Maack. Books and libraries as instruments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Francophone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1(1): 58-86.
- [5] Richard 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5: 153.
- [6] Ilkka Mäkinen. Finland Pays Its Debts and Gets Books in Return: ASLA Grants to the Finnish Academic Libraries, 1950-1967 [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11(1): 211-232.
- [7]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R]. June 15 (legislative day, June 8), 1953: 62.
- [8] The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Eighth Semi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R]. January 3, 1953: 3-5.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 [9] White House. Report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Jun 30, 1953. CK3100103930, DDRS.
- [10]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Communist Propaganda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IX- External Propaganda Media [R]. Aug 1, 1959. CK3100237873, DDRS.
- [11] Pamela Spence Richards. Cold War Librarianship: Soviet and American Library Activities in Support of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1946-1991 [J]. Libraries & Culture, 2001, 36(1): 193-203.
- [12] White Hous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 progress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 Sep 30, 1953. CK3100565719, DDRS.
- [13]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Status of USIA program as of 6/30/59 [R]. Jun 30, 1959. CK3100003435, DDRS.
- [14] Charles A H. Thomas.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e, 1948: 309-312.
- [15]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J]. Book History, 2010, 13: 185-217.
- [16] Kennon H. Nakamura, Matthew C. Weed. U.S. Public Diplomacy: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DB/OL]. www.fas.org/sgp/crs/row/R40989.pdf, 2015-03-15.
- [17] Allen C. Hansen. UIS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 [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129-130.
- [18]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Informational Media Guaranty Program-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R]. January 16, 1958: 7.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 [19] Alfred Reisch. Ide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West's Secret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J]. Military Power Revue Der Schweizer Armee-NR, 2008(3): 44-56.
- [20] Martin Manni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 28-31.
- [21]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Future of United States Public Diplomacy-Report No.6. Together with Part XI the Hearings on Winning the Cold War: the U.S. Ideological Offensive [R]. 1969.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 [22] White Hous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report entitled: "Progress Report on OCB Checklist-Courses of Action to Enhance Progress Toward National Objectives for Western

- Europe.” [R]. Aug 18, 1954. CK3100159591.DDRS.
- [23] Daniel P. Bergen. Communist and American Cultural Strategy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J]. *Library Quarterly*, 1962, 32(2): 111–132.
- [24] Louise S. Robbins. Publishing American Valu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as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J]. *Library Trends*, 2007, 55(3): 638–650.
- [25] Mary Niles Maack. Books and libraries as instruments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francophone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1, 36(1): 58–86.
- [26] Russell H. Bartley. The piper played to Us all: orchestra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the US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01, 14(3): 571–619.
- [27] Ronald Jenn. From American Frontier to European Borders: Publishing French Translations of Mark Twain’s Novels *Tom Sawyer* and *Huckleberry Finn* (1884–1963) [J]. *Book History*, 2006, 9: 235–260.

Oversea dissemination of American books and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mage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ld War

HU Tengjiao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because of the need of counter-attacking communism and dispelling “anti-Americanism”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USA export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on the global scale as an endeavor to build American image characterized as “economic affluence, political democrac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ocial vitality.” With an implicit propaganda against communism, it also contributed to expanding the cultural borders of America, enhanc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American books; oversea dissemination;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mage

[编辑: 颜关明]